

學者的學術傳記

◎ 王振忠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的「往事與沉思」傳記叢書之一。誠如總序所言，「各式各樣的人的往事，構成了一部社會的歷史，也蘊含著人生的真諦」。在東流無盡、亦清亦濁的歷史長河裏，在如煙飄散、漸行漸遠的縈懷往事中，追想沉思這些學人智者的人生風景，它們便帶著彼時彼地的色彩顯影重現於讀者的眼前。而作為傳主之一的譚其驤，他的人生，是否一如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那般色彩斑斕呢？

《悠悠長水》的作者在整理譚其驤先生的全部遺著——包括日記、書信等資料——的基礎上，結合相關人事，描述了他從出生到文革前夕五十餘年的生活歷程。這半個世紀，奠定了他從一個書生到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泰斗的學術地位，也正是中國社會經歷了風雲變幻的五十年。《悠悠長水》中佔據相當篇幅的，便是譚其驤在新中國成立後幾次大的思想改造運動背景下的經歷。這一段歷史背景，從土改運動開始，到思想改造、肅反運動直到整風反右，作者以譚其驤的日記為依據，摘引了大量當時學界同仁的思想匯報，讓讀者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處境、心態一二。時隔三十餘年，當我們重新翻閱這些記錄時，不能不感歎：歷史，真的如悠悠長水，載走了歲歲年年的喧嘩，而把沉思留給了後來者。書中所引資料大多出於復旦園內，字裏行間的名字多為莘莘學子耳熟能詳。閱讀這一段歷史，也同樣讓人感慨：在這綠蔭如蓋、芳草似茵的校園裏，也曾有過這樣不平靜的時刻啊！讀罷這十餘年的經歷，再返回傳記的前半部分，我們看到30、40年代的譚其驤為家庭生計所窘，在各大學之間往返奔波；為避戰事，攜家數次顛沛播遷。誰又能說，譚先生的一生像他的職業永遠是教師那樣簡單呢？作者在書的封底上寫下了這麼一段話：「他16歲參加共青團，17歲以後就不想再過問政治，但政治沒有放過他。歷史給他留下了風霜雨露的印記，他與中國一起度過了翻天覆地的82年。」

誠哉斯言！然而，在一生不可避免地與歷史共寫的時候，畢竟是書生的譚其驤也不能與書本告別。學術，是一個視其為終生事業的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旋律，它貫穿始終，也最扣人心弦。難得的是，這部學術傳記的作者本人，正是親聆其教的弟子——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學者為學者作傳，抑或更具高山流水之雅趣？在這部傳記裏，從青年時代的譚其驤與顧頡剛先生的學術討論直至後來享譽學界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之編纂，作為同一學術領域內薪盡火傳的研究者，作者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將其深入淺出地敘述，力求精煉明白。我們在閱讀前賢咳珠唾玉的手寫筆談時，或會欣然——若非專業人士，豈能將這些專業「文案」一一剖析明白？譚先生在《禹貢》的發刊詞中有云：「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裏看得到戲劇！」正是在學者們的寸管尺幅之間，我們看到了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上演過的一齣齣歷史，看到了社會和人生的百態，也看到了學

術在不斷發展前行中的足跡。

以傳記人，更以傳寫史，從《史記》列傳以來便成為中國傳記著作的一個特色。一部好的傳記，既需要紀實寫真，其本身更應當是傳世的史料。在有關胡適的幾部傳記裏，在他對早年生活的溫馨記憶中，社會文化史學者迄今仍能獲致頗富價值的區域研究史料。《悠悠長水》也不例外，書中除了時一可見的社會及風俗方面的零星史料（如嘉興譚氏宗族義莊、族田、合會的運營，譚父論「合婚選日」及相關風俗習慣的信件等）之外，最為精彩且具史料價值的是第十章〈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此章對於農村社會生活之描摹，無疑具備了歷史的真實感。傳記作者根據譚先生的日記，逐日記錄下1951年秋冬安徽省五河縣喬集村和靈璧縣西葉村的土改情況。其中提到的歷史事實，是研究傳統農村社會實態的珍貴史料。譬如提到在喬集村，由於「當地地瘠民貧，實在找不出甚麼像樣的地主，即使有基本符合地主條件的人，生活也不比旁人好多少。……而群眾最痛恨的卻是二流子和『頑幹』（國民黨基層政權人員）」。這些情況，曾讓譚其驥困惑過。而這無論是對於今天的歷史研究者還是決策者，應當都是一種提醒：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的社會狀況紛繁複雜，絕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理論或統一標準來衡量和處置。

當然，傳記不僅僅是史料的彙編，也不是為一個人作起居注。胡適主張傳記要「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朱東潤也曾指出中國傳統傳記寫作的弊端之一便是直奔史實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畫。一部好的傳記，能讓讀者在字裏行間感受到傳主的呼吸，在極其微小的細節裏瞥見一個靈魂的最深處，而這就要求作者對於傳主本人有著透徹的觀察和深刻的理解。作者是受譚先生親炙多年的弟子，在朝夕相處之間，老人把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吐露出來，甚至包括自己婚姻的不如意。在〈失望的婚姻〉中，最觸動讀者心弦的就是老人自己的表白——「結婚不久就吵，也曾動過離婚的念頭，……到老了還是不好，人家就說：『都這麼老了，還值得離婚嗎？』就這樣過了一輩子。」「就這樣過了一輩子。」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道出了這位蜚聲史壇的著名學者人生之無奈，也讓人看到了事業之外傳主本人的生活面貌。《悠悠長水》中還以譚先生自己的話「最值得懷念的歲月」為題，描寫了30年代在北平的三年圖書館生涯，這也是本書中極具可讀性的一章。「故都風物最宜人」，老北京的衣食住行，在譚先生心裏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也使讀者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文化氣息。那些學者相聚、侃侃而談的公園茶座，實在讓人心嚮往之！如果說，學者為學者作傳，比起一般的傳記學作品或許更為嚴謹和真實，那麼，這一特性也同樣給本書帶來了一些不足。在歷史學者眼裏，史料是著作的血肉，特別是那些首次發表的第一手資料，史學工作者於行文間往往難捨割愛，而總是希望盡可能多地加以引用，這一點，從事過史學研究的學者恐怕都會有所體驗吧。不過，正如梁啟超在比較中西傳記和歷史的不同後作出的判斷所言——歷史所關注的是群體形態，而傳記則應把重心放在傳主的個體形態上。《悠悠長水》第十一章〈從思想改造到肅反運動〉中所引同時代諸多學者的思想匯報材料，對於勾勒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當然具有史料價值，也更能從整體上凸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心路歷程。但從傳記的嚴格標準來說，這些資料與譚其驥本人並無直接的關係，未免過多，在篇幅上也不無冗長之感。另外，書中譚其驥與顧頡剛討論兩漢州制的內容，顯得過於專業。雖然這對於弄清學術思想很有意義，但對於非專業的一般讀者來說，畢竟缺乏可讀性。

悠悠長水，澤被後人。這部傳記描摹了一位學者的後半人生，也是另一位學者自身的思索。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